■聚焦新作

徐晓延长篇报告文学《大漠问天》

一群仰望天空的人

□水 玉

泰勒斯有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徐晓延用自己18年激情燃烧的大漠岁月凝练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漠问天》（军事谊文出版社2011年出版），让我们有幸认识一群仰望天空的人，有幸走近一群用智慧和心血在茫茫太空书写辉煌的功臣。

岁月有痕，忠诚无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支英雄部队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大漠问天》带我们翻开尘封的档案，穿透历史的烟云，去领略航天发射将士的奋斗与勇气、艰辛与希冀、智慧与执著……这部作品是"特殊记忆"和"段段经历"，作者用忠诚与奉献将记忆片段串成精美的篇章。他娓娓道来，全是深情流露，举手投足间尽显豪情。透过他的讲述，我们仿佛看到一支在朝鲜战场上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来到荒无人烟的大沙漠，甘愿"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宁可"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作者一路上艰难跋涉，与知识分子、科学家长期声气相通、心心相印，和基层干部、普通战士建立了血肉联系，自始至终深深地感恩与痴情于这片热土。可以说，航天人理想信仰的生死追随、报国之志的青春演绎、催人泪下的情感交织、西部大漠的神奇色彩，无不闪烁在《大漠问天》的字里行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大漠问天》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缩影，触摸到了那一颗颗为祖国母亲而鲜活跳动、热血奔涌的心灵，感受到了为祖国母亲而燃烧的生命的高度和分量。《大漠问天》的字里行间，无不传递着理想理念。50多年来，这些航天领域的杰出共产党人，在这片神圣的热土上，为了年轻的祖国不再饱受欺凌和屈辱，为了中华儿女早日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恪守着对祖国立下的庄严承诺，把智慧和精力都献给了国防科研试验，用满腔的赤诚奏响了航天弱国走向航天大国、继而走向航天强国的时代最强音，从而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

历尽千难成伟业，人间万事出艰辛。《大漠问天》一书是作者默默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枯燥和巨大精神压力，历经三年多，泣血而就。在他的书中，展示了广大航天工作人员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精神。通过他的笔尖，我们看到，从科研院所到各生产企业，从大漠深处的航天发射场到浩瀚大洋上的远望号测量船，到处留下了航天人艰苦奋斗的足迹，洒下了航天人不懈奋斗的汗水。他们用顽强的意志和杰出的智慧，将"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成功"写在了浩瀚无垠的太空中。

在最危险的"两弹结合"试验中，根据测试发射的安全要求，承担这次试验任务的操作人员数量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经过严格筛选，指挥部慎重决定：由负责发射的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以及发射二中队分队长颜振清、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作手佟连捷、徐虹等7名人员，定位在地下控制室里，执行发射任务，他们被后人称为"航天七勇士"。多年来，"七勇士"按照组织的规定，把自己干过的事情永远埋在了心底。他们没有声音，只有行动；他们没有传记，只有传说。正如他们所说，事业重如门前山，名利淡似杯中水。

神舟四号飞船发射是我国载人航天发射的最后一次"彩排"，发射场突遇从未有过的零下30℃的严寒低温天气。空前的低温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官兵透不过气来。发射场迅速成立了抗寒应急抢救小组，官兵们与老天爷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保温战。然而，给70多米高的船箭塔组合体加温保温，谈何容易！火箭储箱舱体都是用金属做成的，散热很快。外面温度低，热风送进去，马上被外面温度给平衡掉了，而且火箭尾部的发动机不在密封区域内，完全裸露在外部环境中，没有任何保温设施。想来想去，抢救小组决定用土办法，用棉被把需要保温的地方统统包上！地面设备营的战士们承担了这一艰苦而又细致的任务。当天晚上，100多条新棉被调运到发射场，操作人员给被子逐一写上编号，连夜把被子缝在一起并进行保温处理。发射架下，这些平时连缝床被子都显得笨手笨脚的小伙子们，却像大姑娘一样，拿起了针线，并保证在5分钟之内把所有棉被拆下来。几经拼搏，飞船在凛冽的寒风中平安起航，创下了我国航天史上低温发射的纪录。

航天事业，成败系于毫发，质量高于一切。上万人聚集在发射场，成千上万台仪器设备要进行成千上万次操作，要想一点差错都不出，从概率上讲几乎是不可能的。距离神舟五号发射还有40天，一级四台发动机超过最大摆幅，火箭内发生碰撞！操作手郝云亮将连接火箭上综合放大器的电缆插头插错了位置，导致发动机非正常摆动，碰上了火箭的伺服机构。当晚，郝云亮哭着递上一份长达20页的检查。进入射前程序5小时前，助推器Ⅱ和助推器Ⅲ的9号流量计没有显示；进入一小时准备时，火箭利用系统测试电源掉电……发射官兵通过平时苛刻的检修检测和岗位练兵，及时排除险情，将航天员杨利伟顺利送入太空。

而杨利伟为了向太空迈出这一步，洒下了不懈奋斗的汗水。在飞行大队，百米跑他跑出11秒，800米高的山坡他十来分钟就能跑个上下，骑自行车往返100多公里后不觉得累，他专业成绩出类拔萃，遇到危急的"空中停车"仍能把飞机安全降落机场，所以他能在全国1500名优秀飞行员中入选到航天大队。在航天大队中，他从886名入围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航天员。在航天员中，他废寝忘食地苦学航天专业知识，训练认真刻苦，从13个航天员中被挑选到"三人首飞梯队"。他通过了专业技术、操作技术、基础理论、心理、航天环境耐力和适应性、救生与生存等考试，还通过了超重、头朝下睡觉、高强度运动、转椅、模拟冲击、宇航模拟训练，一次次挑战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最终成为中国航天第一人。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千回百转、绚丽多彩的雄浑画卷，而航天人在画卷上添了浓厚的一笔。他们从不为道路的曲折而怨声载道，从不为事业的艰辛而半途而废，更不会为个人心灵上的创伤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因为他们有着一样的赤诚。正因为此，他们这一代人来到艰苦的地方，却终生不悔。正因为有了他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昭示出光辉前景。历史的亲历者用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栩栩如生的描述，把我们的思绪一次次带回那些渐远渐逝的年代。

■关 注

关于重写与重读的思考

□朱玲玲 张 中

当前，在文学或文化批评领域，"重写"这个词汇很是时髦。当然，也一直深得人心、屡试不爽。比如，什么"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化史"、"重写现代性"等等。但是，说这些的时候，他们也必将陷入三个逻辑困境：即，为"何"；何"为"；"谁"为之。现在，再缩小一下范围，就谈谈"重写文学史"问题吧。我们发现：在这里，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比其他领域更为严重一些。

无论是对于古代、现代、还是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事实上都需要运用"批判"的视角和立场。如上所言，"重写"首先意味着对先前历史或事业的不满意。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何而不满？

长期以来，囿于政治、历史、文化的因素，或者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确实是存在着问题的。比如，二元对立的观念依然还在作祟；宏大叙事和名家主导也依然是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学史就是彻头彻尾的垃圾；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学史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可取之处。所以，不满应该是相对的。

事实上，我们对于任何事情的批评，往往会陷于其表面化而不能深入，也经常会被外在的东西所干扰。这样一来，我们的批评也就会有意无意地游离主题，或存在偏颇。尤其是，当我们的批评不能从原点出发，不能从事情本身出发，那么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但不管你如何做、或者说做得如何好，"批评"本身也都会被看做是"暴力"。也就是说，批评有对现存某些机制的威胁之意。那么，当我们重新建立一种观念，是否也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走出它们的窠臼——甚或是，乃一种新的"暴力"？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也必然随之而来：谁在"重写"？谁能够"重写"？而这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大都仰慕那些大家、硕儒，或者学识渊博的大师。故而，由他们来"重写文学史"看起来似乎是众望所归和无可争议的。可是，现在的文学史"重写"，其实大都是由一些通过各种手段得来的所谓的"项目"在写作。即是说，真正的大师或名家如果拿不到资金或"项目"，那么他们想"重写"也"有心无力"——更何况，他们也一般不愿意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事实上，文学史写作应该是一个严肃认真而又任重道远的事业。它需要长时间、多单位、多学科的学者广泛团结与协作，也需要他们皓首穷经的探索与努力；甚至还需要广泛听取民众意见或建议，几经易稿，方可成型。而仅仅做到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时间和读者的检验和修订。如此，才能算做一次真正成功的"重写"。因此，可以说，如果一定要或者说必须要"重写"，那它也将必然是一个漫长的、不断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痛苦之旅，而绝非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因此，真正的"重写"，其实应该是一种反思、判断和实践；也是一种继往开来的批判；更是一种面向未来和面向无限之可能性的探索与实验。所以，利奥塔认为，"重新"还有着另外一层意思："由于它本质上与写作相关，所以它丝毫没有回到开端的意思。而更多的是弗洛伊德的所谓'追忆'，也就是一项工作，它力图基于事件和事件的意义来设想不仅被过去的先入之见，而且被诸如方案、计划、展望、整个精神分析的建议和谈话等具有未来维度的先入之见构成性地对我们隐瞒了的东西。"而这也意味着，真正的"重写"，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暴力"的引诱和教唆；但它有自我提升的可能性空间和诉求。所以，它将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事业，也是一种值得称道和值得鼓励的事业。

如果，孤立地、且以善意的眼光来看，从"重读"到"重写"，再到"重建"，我们可以知道：它们之间有一种思维和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但它们其实也暗暗反映了人们的渴望创新、追求卓越的雄心。虽然这些话语有些言过其实或虚张声势，但也有很多值得我们追索和回味的地方：比如，"重xx"话语本身其实从表面上来看，它实际就是潜藏着暴力的；但是，我们也有将其引领走出暴力渊薮的可能性。当然，这就要看你如何选择，或者说如何做了。从表面上来看，所谓的"重xx"似乎只是一种话语实践，然而，它往往反映着人们的这样一些意识或心态：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好高骛远，或者是不求甚解、夜郎自大……事实上，我们十分需要一种真正的"重读"、"重写"或"重建"。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到这样一些事情：即，在力求独立、创新和实践的基础上，从生活原初的经验出发；基于真实的感悟、卓绝的努力，以及自我的批判性经验。惟其如此，所谓"重写"才有可能；而我们的努力也方可有所建树。当然，所谓的"经验"，其实就是如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真正的经验就是对我们自身历史性的经验。"所以，"重写"既是一种自我或主体的经验性"再写"，也是一种批判性"修订"，更是一种自我的形成性之"方案"……虽然，"重写"的"暴力"阴影永远如影随形。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以反思、批判的眼光，以真实与真诚的态度，以创造和探索的精神来对待，"暴力"就将减退、消弭……而那些建于此基础之上的、那些创新意义上的"重写"——即一种建设性的"再写"、"续写"或"改写"才有实践的可能。

事实上，任何"重写"，一经实践，它就有将其意向对象逻辑化、客观化的嫌疑、风险、甚至是诉求——而这按照德里达的逻辑，就是"暴力"。不过，这些其实并非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其实我们更需要重视"重xx"话语本身的"暴力"。因为，这种话语往往更反映着话语持有者的意识、思维和逻辑之中的"暴力"。而这些往往又是根深蒂固的——它并不能在短期之内或在瞬间就被拆除。

那边风景旧曾谙

□李林荣

那边风景旧曾谙。令我有这种感触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近年推出的一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丛书共计十位作者十本散文集，分三批，在一年内陆续面市。选题策划人是台湾大学出身的中文教授周志文，也是丛书最先四册的作者之一。除此之外，颜元叔、龚鹏程、林文月、马森、黄碧端、尉天骢、陈芳明，这几位岛内文史学界有影响的人物，以及建筑学者汉宝德、森林学家金恒镳，也都各有一部散文集，列入了这套丛书。

就职业身份而言，各位作者几乎清一色都有较长时期专事教研的学院派阅历，好几位还是从教职退休。因而，整体上看，"学人散文"之称，可谓名副其实，恰如其分。只不过，可能受限于跨海瞭望、越"境"阅读的视域和信息制约，十位作者中，惟颜元叔、尉天骢、马森、林文月、陈芳明，在我旧有的台湾文坛学界的认知图景里，印象还算鲜明。周志文的笔名"周东野"，龚鹏程近年在大陆高校及出版界的活跃姿态，也已让我有所留意。汉宝德、金恒镳两位文学圈以外的专家型散文家，则纯属初识。

尽管如此，即以遥望概貌所得的片段印象或间接辗转而来的二手资料为依据，与我类似的许多长居大陆而心系海外的书友和文友，对包括台湾在内，或者倒不如径直说，是以台湾为主的整个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学者惯写并且擅写散文的风尚，也不难有清晰深刻的具体感受和宏观印象。

远的不论，十余年前，大陆文坛新一轮"散文热"的盛筵排摆到作者和读者面前，陈子善编选了一本《未能忘情——台港暨海外学者散文》，把一个代际分明、阵容赫赫的海外学者散文创作队伍，呈现和介绍给了大陆读书界。

可当时及至今日，按我们寻常读者和散文爱好者思想意识深处某种不证自明的"想当然"逻辑，同所有其他体裁、其他方面的文学创作现象一样，涌现在海外文坛的学者散文家和他们的散文作品本身，充其量也终究不过是大陆学者散文家及其创作活动的一个边缘映像，或出于追仿和模拟，或只为附骥和衍生。这显然是成见，它毫无根据，却极易造成实际影响，导致文学传播和接受行为上的偏差。于是，上世纪90年代大陆散文界兴起的学者客串写作现象，被不由分说、毋庸置疑地当成了事实上源远流长、历史背景和社会土壤更加宏阔丰富的海外华文学者散文写作的根系、来路和出处。

现在，总算有越来越多的创作文献类的出版物，开始切近地向大陆读者展示、见证海外华文文学潮流里的学者散文，是怎样地与20年来风行、泛滥在文学市场化热浪中的大陆学者散文迥异其神、背离其形的了。仅以这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来看，周志文《第一次寒流》的文笔精悍、温润而又阅世深切、冷静的风致；黄碧端《昨日风景》的文思闲逸而又不乏沧桑感喟的情调；马森《旅者的心情》洒脱的行踪与心迹相映成趣，谱就别样人生情态的笔墨神采；尉天骢《岁月》铺陈往事、缅怀故旧，诉尽文学人生万般悲欢的厚重；陈芳明《掌中地图》低回绵密、顾影徘徊、辞章华美、高标自我、清冷孤傲溢于言表的况味……所有这些，都充分表现着海外学者散文斑斓多姿、绝不在文风语体上向单行道和两极对立面蜂拥积聚的个性化特点。

学者的共同职业身份，书斋生活和学院浸染合力成就的浓郁的人文气质、雅驯的属辞习惯，这些表里内外的一律性，都没有掩盖海外学者散文的一部分优秀作者形之于文的那层夺人心目的个性光彩。这里一个关键的成因，或许并不在于这些作者本人的某种有意识的、主观强求的努力，相反，倒更有可能是主要托靠了客观生存环境。那是一个不从人性的基础层面或日常生活的总体姿态上对学者群体做刻板要求和机械塑造的环境，一个能够确保不仅限于学者的各种社会行业的从业者，都享有人格自然发展的必要宽松空间的环境。

只有在这类文化处境中，学者才能自觉、自愿，同时也是自主、自在的文化建设者，文学性的写作也才能与他们复杂、丰富的人生实际，妥帖地结合起来，显现出照此本该有的一分风骨或者光彩。而臻于此境，其实也完全不必仰仗未来。同是中华文化圈，海外华文圈和大陆文化圈，前者给学者文人余留了一角舒展个性、收放情志、俯仰进退、回旋转圜的精神余地，后者则形成了把学者乃至文艺创作者一概当做从标准化配料的流水线上产出的规格化、模式化的听装罐头来处理的新观念和新习俗。

究其原由，最重要的实质上也只在一点，简言之，就是在台湾、在整个海外华文存续传播的社会里，传统中国社会安顿文人、文学的方式没有发生彻底的变化。一方面，文人保持了相对崇高的社会地位，有直接向现实问难的精神形象和文化资格，因而也就有相应地凭据知识和文化来超越社会现实局限、现实压力的特殊的阶层优势；另一方面，文人与文学的联系没有被切断，文学生活也就不曾从文人的精神世界里被抽离出去加以硬化、提纯和格式化，而得以一如其旧，用在温软和坚实、至柔和至刚之间往复震荡，用济世与出世、极功利和极超逸、极公极私、极宏大而又极自我等多变的面相，继续生龙活虎、姿态万千地存在着。

越过"台湾学人散文"这一丛十本书，以及十本书所示的十种学人身心生活的绮丽风景，当代文人与学人，远观复又近察，两相比较，又怎能不感叹一声，如今远远飘零、闪烁在海外文坛的好些亮点，其实满是我们大家都该无比熟悉、无比珍视的民族文化传统里最动人也最有活气的那缕余风流韵。

■第一感受

我读《阖闾王朝》

□章德宁

《阖闾王朝》写的这段历史对广大读者并不陌生。百年来，以这段历史为背景、为题材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包括民间传说、说唱、戏剧乃至影视作品有很多。春秋战国时代，创造了我们华夏民族辉煌、灿烂的文明、文化，一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今天。无论是孔子、老子、庄子、鬼谷子、墨子、孙子、韩非子，无论是周易、春秋、还是四书五经，包括屈原的"离骚"，都是那个时代的硕果。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军事家、谋略家、治国人才的产生，几乎是空前绝后的。

最辉煌的创造，不仅仅在文化上，更在精神上，譬如，我们今天仍崇尚的士可杀不可辱、不为五斗米折腰、为朋友两肋插刀、不事权贵、孝敬父母等等，作为人应有的气节、侠义、精神人格的大美，都是那个时期创造的。而且，对这种精神品格的崇尚，不是个体性的，而是集体性的，是集体的人格精神的大美，它感动着、感染着、感召着我们的民族，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直到今天。应该说，我们在谭嗣同、抗战英烈们的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精神人格大美的传承和影响，这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中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阖闾王朝》的作者，把小说放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来展示故事、刻画人物，已经抢到了先机。

读这部作品，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历史眼光和大气魄，对于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风云变幻的政治局面的大题材的驾驭能力和把握能力。这样一个近百年来被不断写过的题材，作者再去写，稍不留意，就会落入窠臼，就会捉襟见肘。可以说，面对这样的题材，是需要勇气的，而《阖闾王朝》作者，以小说的形式，虚实结合，如此大规模地再现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事件演变、丰厚背景，以及军事外交、政治权谋、世态民心、民俗风情，不能不说是对吴越文化的一次全面挖掘、一次弘扬贡献。小说中有不少精彩的场面描写，有不少传神之处，神来之笔。比如五百宫女练兵的故事，丰富了历史上的传说，有很多治国道理、管理方法在其中。吴越阵前，越国死囚用鱼肠剑自尽的场面，惊心动魄，想象若用在影视中，也一定会惊心动魄。再比如专诸杀僚的瞬间，描写传神到位。对专诸的身世，小说进行了许多虚构，对他夫人的命运的描写，使现代人对专诸这位刺客、勇士的行为更能接受和理解。津香这个人物是倾注作者情意的人物，在对津香命运的刻画中，蕴含了作者对世事的看法，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历史小说，从来都是借古喻今。如何在历史传统中挖掘出人所认同的价值观，这是历史小说的价值所在。津香在伍子胥受难时，表现了仁、爱和善；在伍子胥腾达时，表现了自尊，不攀附权势；在伍子胥掘墓鞭尸时，站出来痛斥，反对以恶制恶，这代表了民族文化中的信和义。通过刻画津香这个人物，展示了民间的正义和良知。

中华文明历史上一直有两种文化：一种是仁爱文化，讲求的是仁义、仁爱，以德报怨，也是一种恕文化。而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博爱，不但是异曲同工，且是异曲同流。另一种文化，是仇恨文化，讲求的是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父仇子报，这种复仇文化发展下去，结果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阖闾王朝》的作者，在表现伍子胥掘骨扬灰的故事时，有自己的文化反思和价值取向。他设计了津香的劝戒，设计了孙武的不认同，和普通百姓的抵触，都表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站在几千年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再进行简单的赞美，实际是对仇恨文化的反思。而孙武结局的设计，也表达了和平主义的理想，这些都令我们欣慰。

这部小说稍有不足，便是未能将这种反思贯穿始终，且未能与学界的某些成果、思想认识同步。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中表现出的文化精神、文化命运的捕捉、还原、开掘，还可以更加深入和深刻，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对阖闾王朝的兴亡，如果站在今天的高度给予这段时期以历史的思考，让今人有所借鉴，作品似乎就会更有力量。

■评 论

知青题材创作的新收获

——评长篇小说《致我们遥远的青春》

□诸天寅

北京作家吴亚的《致我们遥远的青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认为这部40万字小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较完美的作品，也是知青题材创作的新收获，堪称"后知青时代"创作的佼佼者。具体说来，小说在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值得称道：

其一，它生动呈现了一段知青的心灵史。"文革"是我们民族的浩劫和灾难，知青上山下乡带有这种苦难印记。作品以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工业三连为描写重点，共写了88个人物，其中一半以上是鲜明生动的知青，小说表现出其承受的苦难，揭示出心路历程。知青到达北大荒后，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个别基层领导的生活作风问题的败露，使他们渐渐产生了怀疑，在心路历程上发生了改变，从盲目崇拜的狂热心志，转变为被欺骗、被愚弄的心态，纷纷陷入苦闷之中，想方设法托关系送礼，一心想离开北大荒。小说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知青心灵史，对研究知青运动的发生、发展到结束，很有帮助。

其二，小说塑造了为数众多的鲜活人物形象。吴亚是北大荒知青，熟悉"荒友"生活，笔下形象性格各异，不同人生境遇的知青，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使读者与之休戚与共。小说通过刘涛这个普通战士的独特视角，见证了整个兵团知青的喜怒哀乐，再现了那段特定历史，让读者在反思中获得启发和教益。另一个人物是杨光伟，他出口成章，曾经当过中学"红代会"常委，他从哈尔滨带来《青春之歌》等十几本长篇小说，在知青中传看，造成"黄书事件"，结果他被撤销副排长职务，送学习班强制改造思想。小说中还写到一些女知青，像裴清、姜虹、郑秀娣、卢琴等，富有个性，追求所爱。吕晓燕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从小失去父爱，不择手段往上爬，不惜伤害战友，苦苦寻找感情归宿，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类人物属于"文革"的牺牲品，具有鲜活的历史局限性与民族劣根性，读者只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小说还写到几位殉难者，例如意外死亡的乔援朝等……他们的死，既是一种控诉，也是留给亲友的永远伤疤，发人深省。小说塑造人物深得鲁迅白描手法之"三昧"，努力做到"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在众多的人物性格世界里探微索隐，并生动袒露在人们面前，让读者品味和思考。透过人物经历，重新审视"文革"以及知青大潮。

其三，两性之间的情欲描写恰到好处。小说在描写两性情欲上，掌握了适度原则。知青处于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对异性十分好奇与敏感，特别是与异性单独相处或肢体有所接触时，内心的激动与亢奋是可想而知。如小说写到刘涛与上海女知青郑秀娣练习表演唱的描写就细腻入微，丝丝入扣。此外写刘涛与白晓娴初次约会时忘情拥抱等，符合青年男女亢奋情感，既无挑逗性的低俗描写，也没有越过自尊的道德底线，整体上属于健康、高雅的审美范畴。如何表现情爱与性爱，本书提供了多处可资借鉴的范本。

第四，诗化的语言与传统出新的结构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作者有几套语言，写人物对话是一套，写景叙事又是一套。在写景上，作者善于调遣诗化的语句，描绘出一幅幅北大荒的风景画。作者纯熟、灵活驾驭语言的能力，细致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使小说增强了北大荒地域特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小说结构完整，既符合传统上有头有尾、环环相扣、善恶终有报的审美心理，又采取较新的长线穿珠式结构，以兵团生活为主线索，将事件按时间顺序贯穿起来。读来有条不紊，张弛有序，从人物的命运起伏中感受到心灵的激荡和审美的满足。